

旧语体的新思考：张中行与文言教学¹

New Thinking of Old Linguistic Features: Zhang Zhong-Xing and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刘怡伶^{*}

Liu Yi-Ling

摘 要：张中行（1909-2006），字仲衡，原名张璇，河北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19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涉猎广博，著述丰硕，凡语文、文学、佛学、哲学，均有相当的治绩，并与季羨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20世纪未名湖畔三雅士”。学界关注其人其事，已累绩不少成果，唯所长期致力的文言文教育，却相对为人所忽略。他做过一线的中学、大学教师，也编辑书刊及从事学术研究，长年涉足语文教育事业，有不少关切语文教学的著作，本文即聚焦其《文言常识》、《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诗词读写丛话》等作，探究他所提点的文言基本常识、对文言教学的想法及具体指引，并从中提取重要观点以为今日语文教学的借鉴。

关键词：张中行，文言文，文言学习，语文教学

Abstract: Zhang Zhongxing (1909-2006), “capping name” was “Zhong-Heng”, and his given name was Zhang Wei, was born in Hebei Province of China. He was a famous modern scholar and writer, who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University in 1930s. He involved extensively in many fields and had a lot of literature works with very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Buddhism and philosophy. Ji Yanlin, Jin Kemu and himself were known as “Yanyuan San Lao”(the three aged masters in Beijing University), or “Three Refined Scholars at the lakeside of an Unnamed Lak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paid attention to his achievement, however, hi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classical Chinese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neglected. He has worked as a front-line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teacher, he has also edited books and journals, and

¹ 本文是106年度奖励教师专题研究计划（计划编号：smc106-I-13）的研究成果之一，经费来源为教育部奖补助款。初稿承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学者学术辅导与咨询计划”之薪传学者耿志坚教授赐正，以新观点反思张中行的见解；又承科技部专题计划“启蒙维新：商务印书馆与现代初等国语教科书的转型（1902-1922）”（计划编号：MOST 106-2410-H-562-001）经费挹注得以出席“第二届华语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口头发表。以上，一并致谢。本文是会后的修订稿。

^{*} 刘怡伶，（台湾）圣母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 ncue610@gmail.com

engaged in academic research.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many years and has published many books about language teach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works such as “Common Senses of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in classics”,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Various topics about writing composition”, and “Poetry Reading and Writing”, exploring the basic common sense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pointed out by him on his thoughts and specific guidelines for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extracting important viewpoints as the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day.

Keywords: Zhang Zhong-Xing, Classical Chinese, Learn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一 前言

张中行（1909-2006），字仲衡，原名张璇，后改为中行²，河北人。1929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1931年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读，问学于黄节（晦闻）、马幼渔（裕藻）、钱玄同、朱光潜、熊十力、马叙伦、刘半农等名师，其与叶圣陶、吕叔湘等语文专家亦有交谊。1940年代编过佛学刊物《世间解》、《现代佛学》。1949年后，供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负责编务，也担任特约编审。他曾执教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以及母校北大，与季羨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20世纪未名湖畔三雅士”，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

涉猎广博的张中行，于语文、文学、佛学、哲学，均有相当的治绩，目前所能掌握的作品，即有：《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和白话》、《文言漫步》、《负暄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谈文论语集》、《负暄三话》、《说梦楼谈屑》、《横议集》、《说书集》、《流年碎影》、《说梦草》、《散简集存》、《步痕心影》、《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观照集》、《流梦集》、《关于妇女》、《张中行选集》、《月旦集》、《桑榆自语》、《张中行近作集》、《写真集》、《张中行散文选集》、《张中行散文：临渊而不羡鱼》、《不合时宜》、《名家析名著丛书——张中行名作欣赏》、《清风明月》、《柴门清话》、《张中行散文（插图珍藏版）》、《张中行散文选集》、《张中行自选集：南郭竽声》、《世道杂谈》、《北京通丛书：张中行讲北京》、《北京的痴梦》等，根据其友人“尽心”（即“靳欣”，女诗人）的说法，大概有三十多本（其中选本或有重复收文现象）（尽心，1999：页13-14）³，其中，不少是关切语文教学的，例如：《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古代散文选》、《文言读本续编》、

² 张璇，乃小学启蒙师刘瑞擢据《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命之。北大毕业后，因觉得“璇”字难认，再改造字号“仲衡”，拿掉「仲」的左偏旁人字及“衡”字中间的鱼字，成为“中行”，卒以“张中行”行世。中行，并含有《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易经》“中行，无咎”的惕励之意。

³ 按：她个人即获赠张中行签名书21本。

《文言津逮》、《作文杂谈》、《文言和白话》等。现有对张中行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大陆学界，台湾方面则未有专门的研究，且研究成果偏于其散文范畴，对致力甚深的语文议题之关注却相对贫乏。

目前针对张中行在文言教学上的观点及做法析论之相关专著，非常有限，仅大陆地区的一本硕士论文：陈慧佳《张中行教育理念对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实践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受限所掌握资料及硕士学位层级，缺乏深入发挥，且重心置于大陆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的检讨。该论文之提及张中行，主在借用其观点以进行实际调查、分析，从而反省当代教与学既存的问题。其他有兼及文言议题的写作研究论文，但属零星，如：张建华《张中行作文教育思想初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谢赛《张中行作文教育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至于单篇，在台湾，根据进入国家图书馆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以“张中行”为检索关键词，只显现张昌华刊载于《传记文学》的两文：〈一介寒士半生坎坷——张中行的百年人生〉、〈我为他们留过影〉，对张中行的专门研究仍有待开拓。中国大陆学界虽已累积一些研究成果而有涉及文言议题者，但数量寥寥并以简介式居多，如：许剑宇〈张中行作品中成语意义的活用问题〉及〈张中行作品中的汉语成语规范问题〉、邹小千〈浅论张中行、周振甫先生的文言文阅读观〉、熊江平〈要学点文言常识——介绍张中行主编的《文言常识》〉、编者〈张中行主编《文言常识》行世〉、魏红岩〈张中行语文教材编辑的佼佼者〉。除此之外，多集中于散文范畴以及回忆录式的评析，着重其散文写作、追念其人或婚恋故实等。

职是之故，本文锁定张中行的文言相关著述，如：《文言津逮》、《文言与白话》、《文言常识》等，并兼及《作文杂谈》、《诗词读写丛话》等作，又结合其散文随笔《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及回忆录《流年碎影》、《补学集》等，具体探索其文言教学的理念与实践，并从中汲取值得当代文言教学参鉴之处。

二 对文言的基本认知

张中行在《诗词读写丛话》里特别强调祖先留下的诸多遗产中，语言文字是“有大用”、“值得珍视”（张中行，2013：页3）。文言与现代语（白话、语体）具血缘传承的微妙关系，彼此非陌生的另一种语言，其云文言是“本土的，与现代语有血肉的关系”（张中行，1998：页80），这关系是“藕断丝连”（张中行，2016：页80）——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读文言、谈文言，细琐的先不论，单就对待的态度，他即持“兼容并包”（张中行，2013：页99），尤其正反意见都不忽略，在充分掌握个中的异同优缺点后，也不吝提点可行的学会文言之道。他对文言的重要观点，除了见于专册，若干看法亦散见其他随笔，囿于篇幅，酌举如下：

2.1 文言的历史功过

何谓文言？张中行在〈文言的历史〉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文言是旧时代文人惯用的书面的表情达意工具。我们通常说文言，可以指表达方式。”（张中行，2014：

页18)⁴表达方式外，文言也可以指作品。张中行指出早期的书面语，包括甲骨文、金文及《尚书》等皆是，而秦汉之作则是定型了的文言，其后的文言以秦汉为准，多把秦汉之作当成范文，至于旁出的骈文、诗词等藻饰一脉也属文言。张中行以狭义的视角解释文言文，认为主指秦汉时代的书面语言或沿袭该时期风格之作。

张中行也认为当文言形成之后而成为脱离口语、脱离群众的书面语，往往功、过相伴，他表示：“它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是我们一份可观的财富。财富，有用，因而它一定有功。但它脱离群众，总是在上层文人的笔下打转转，又不能无过。”（张中行，2012：页45）由于功、过，系属价值的评断，因此，张中行也不讳言难免有仁智互见的问题，但就大的面向，自认所拈之考察角度，估计可为多数人接受。为便于说解对照，兹整理其对文言功过的论点如下简表：

表1 文言功过简表

功过	项目	
五功	着眼文化整体	1. 文言积累丰富的文化遗产 2. 文言利于汉语文化的内部调和及坚韧结构 3. 文言是好的交流工具及团结纽带
	着眼个人直接效益	4. 文言曾是表情达意的好工具 5. 文言有大量值得欣赏的作品
六过	1. 助长文白分家 2. 脱离群众 3. 阻碍白话作品成长 4. 思想方面有糟粕 5. 有些作品华而不实 6. 有些作品是文字游戏	
备注：整理自张中行〈文言的功过〉，《文言和白话》，页45-69。		

此表，可看出张中行以文言的常识来着眼，就大舍小。他首重的文言优势是一一可以积累丰富文化遗产，文言这部分的用处他认为是最大、价值最高，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它用一套符号保存了前人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类活动是不能流传或没有流传，如孟子的思想和阿房宫的建筑之类，只有靠知识才能够流传的；第二，不管哪种性质的人类活动，只有保存在书面语言里才能够确切细致。这只要翻翻起居注、

⁴ 按：耿志坚教授对文言的“文”，提供如下的补充意见：“‘文’是精练的修饰，在宋朝发明纸以前，无论是甲骨、钟鼎、简策、帛书，因为得之不易，所以文句要精简，也就是用最少的字，表达最长的语意，而且为传之久远，所以语义、语法变化不大，又由于叙写者多为知识分子，所以在文学的立场上加上了美、律、情境的要求。宋朝发明纸张以后，因为书写工具取之较容易，所以民间文学走向语体，例如：宋话本、元散曲、明传奇、清小说都是采语体文撰写，现今白话文学即是由此所延伸，所以各个时期的作品，语汇、语义、语法即有相当程度的变化，由于叙写者多为民间或不具功名的人，所以在文学的立场为浅显、通俗、口语。如此才形成了张中行所谓的上层与下层的差异。”感谢耿教授指正。

实录一类就可以知道；第三，书面语言之外的一切遗迹的情况，常常要借助书面语言才可以了解清楚。举个早期的例，如殷墟甲骨，假使没有书面语言，我们就不能知道那是占卜的工具。（张中行，2012：页46）

基于前述，他主张无数的文化遗产中，就以挂起“书面语言”（绝大部分的文言）招牌的那一个库藏之价值最高，且人类不断进步亦多仰赖于通过写成书面语言的途径。张中行进一步归结文言在积累文化遗产上的大价值及大用，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鉴往知来，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走对路，不走错路。其二是以前人的收获为资本，向前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其三是欣赏，取得艺术享受。（张中行，2012：页49-50）

当然，这其中难免有旧时代的思想糟粕，但张中行认为这个责任不应由文言负责，因为糟粕的制造者实源于不合理的社会而非文言，唯糟粕得以往下流传，文言确实也扮演了储存的角色，所以即使罪不大也无法完全免责，如他所比喻的“文言虽然没有参加抢劫盗窃，可是它窝了赃。”正因掺杂旧时代的糟粕，对待文言就不能囫圇吞枣照单全收，他主张应采“批判地接受”（张中行，2012：页61、50）——而这亦其对文言功过问题的基本态度。

2.2 文言的现代意义

关于文言的致用，张中行强调以吸取自己所需为主，但什么内容才是有价值的、所需要的？此即牵涉怎样分辨与取舍的见识，具备识见了，就懂得吸取。但“有用”这点如何量化？张中行坦承其实不容易说清楚：“接受文化遗产的事相当模棱，怎么样算已经接受了，接受了多少，都不是尺寸升斗可以量出来的。吸收表达方法以充实现代语也是这样，多少，好坏，不容易说清楚。”（张中行，2012：页217）尽管如此，若从“质性”、“感性”出发，“有用”乃是可以真切体会的——“读多了，理解了，心里确是多了些什么，有时候这多的什么还会成为至少是加入处理社会生活的力量，这就是致了用。致用也有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那是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张中行，2012：页217），此外，还可达到“旧为新用”的好处——把文言表达的优点化入（吸收）到现代语文。大致上，张中行的文言致用观，集中在艺术、实用视域去发挥：

其一，强调文言富含精神食粮：文言作品可陶冶心灵、提升艺术素养。

学与不学，都有其理据，就文史专业的学者，固然不能不研究文言；但对其他的一般人，有机会学而不学，其实也无碍于处理日常事务，只是少了欣赏文言典籍的乐趣与精神的抚慰。他从精神、无用的层面论文言，如古典诗词“脉脉不得语”、“人比黄花瘦”云云（张中行，2013：页3-5），常使人百读不厌，甚至赔上一些泪水，故吟咏诗词可抒发幽微的情意。

张中行个人虽倾向非学不可，却也能理性看待不学文言的多元选择，说道：

生为现代人，用现代语，不会文言没什么了不得，处理日常生活，甚至在某方面有成就（包括写作），都不会有什么大妨害；不过生为中国人，有容易学会文言的条件而

没有学，以致放过欣赏《诗经》《楚辞》《庄》《列》《汉》以及诗、词、曲等等的机会，也实在可惜。（张中行，2000：页86）

有条件学而错失学习机会，殊为可惜，他多次强调不学文言的损失，并以切身的经验为例：

损失，意义有二：（1）文言典籍是知识的宝库，你没有钥匙，打不开锁，从宝库门前过空手而还，这当然是损失。（2）宝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艺术品，这是我们都看重的精神食粮，显然，你不会文言就不能吃，表面看来关系不大，实际不然。这要靠个人体验，难于详说。我有时回想，昔年涉览文言典籍，消耗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不少，也许不值得。继而一想，因为勉强会了文言，我有时就能够念念《楚辞·九歌》，念念《史记·伯夷列传》，念念杜甫《秋兴八首》等等，这常常使我能够在愁苦中得到一点欢愉，凄凉中得到一点安慰，以盈余补亏损，也许还有些剩余也说不定。（张中行，1998：页80）

以文言书写的文化宝藏，其中值得欣赏者多，学会文言如同持有一把可以打开宝库的万用钥匙，宝藏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得到阅读愉悦及安顿心灵。

其二，强调行文借鉴的益处：文言词语裨于现代语文表达。

文言有许多优点可吸收，张中行指出如：句子篇幅简练、词汇丰富、表达方法变化多、练字修辞功夫深、写景写情长于造境、辞令表现委婉、句法整齐、声音和谐，以及百花齐放的风格等（张中行，2016：页140-144）。因此，他强调多体会及学习文言，有助于现代语文的表达，尽管中学生面对文言文，常有阅读及文义理解的障碍⁵，但整体而言，所谓的学文言，张中行并不认为是重新学习另一种语言，他从五个面向说明文、白“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紧密关系：

（1）文字都是用汉字，只是文言中生僻字多一些。（2）语音也是承袭多于变化，因而我们还能以普通话的语音读并欣赏骈文和诗词曲。（3）词汇变化比较大，可是像牛、马、山、水等许多词，我们仍在原封不动地沿用，像蹇额、凝眸、致知、格物等许多词，现代语虽然不用了，却不难望文生义。（4）现代语，尤其成语，其中有大量的文言成分。（5）句子结构方面，古今差别很少，如《孟子》第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现在不是还得这样说吗？（张中行，2000：页85）

⁵ 学习文言有阻碍，张中行指出往往是因文言的组织及表达问题所致。组织方面，包括字、词、句、篇；表达方面，则有押韵、对偶及用典问题。此可详其〈文言的特点〉，《文言和白话》，页70。又，当今台湾学子面对文言文的困惑，耿志坚教授曾分析个中缘由：“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原地区的官话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分，致使汉语在口语上产生许多的变化，尤其在进入了以北京语为官话的时代，新的语音、词汇、语句虽然丰富了汉语的内容，却也改变了许多汉语的习惯。它使文学的语言在形容事物、描绘情景的语汇上更加多元，为了完整的表达语意，语言的音节变多了、复音词增加了、表达的方法也改变了。加上外来文化、外来语言间接的影响汉语的表达习惯，演变到书面语言，使现今的中学生面对文言文课时，常有阅读和文义理解上的障碍。”（《基础文言文活化阅读教与学》，2016，页41-42）耿说一并系此备参。

此外,就实利、有用的角度,张中行认为白话更是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凭借,如到鱼市场买鱼,买卖双方即需仰赖问答而成交⁶。

历来对待文言的态度,主有“学”与“不学”两派,张中行谓:

一种是“不学”派,说学了文言(主要指青年学生),对学现代文非徒无益,反而有害。另一种是“学”派,说学会文言对写现代文有帮助,甚至说,想写好现代文,非通文言不可。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究竟谁是谁非,又是个非简单的“是”、“否”所能解决的问题。(张中行,1998:页75)

学习与否的论点取择,往往导因于影响白话文好坏的不同认知,而张中行的观点是:文言词汇丰富、行文简练、句式灵活多变,就表达方法,文言文通了对写现代文章应有好处。因此,力倡学好文言的重点在于:“学通”与“善于利用”。学而未通、吸收不当(如硬挽词语而致文诌别扭),非徒无益恐且有害。就写作,文章写得好不好,与使用文言或白话关系不大,为人诟病的文白夹杂现象,张中行认为实情是白话文本身即写不通顺,“即使文言会搅扰现代文,也总是因为现代文没有通才有此现象,说学了文言而现代文不能通顺是本末倒置。”(张中行,1998:页75)学生写不好白话文的原因很多,如:“读得太少,所读之物有些并不高明,读法不恰当,写作练习不得法等等。”(张中行,1998:页75)

张中行与开明派如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王力(了一)等语文专家的观念近似(至于学习文言的操作面,容或有些侧重不一的差异,详后述),彼辈基本上都认同文言对现代语文表达有正面作用。张中行在《流年碎影》里直称受“开明传统”的影响,曾与吕叔湘合编文言教材如《文言读本续编》,而吕亦为张所撰《文言津逮》命书名、写序文,张中行说过“吕叔湘先生与我关系很深,……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治学,我,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应该奉吕先生为师,学他的诸多方面。”(张中行,2016:页64)至于叶圣陶,张则谓“叶圣陶先生是我敬重的师辈,交往近四十年,……我基本上是叶老的信徒。”(张中行,2013:页45)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让学生得以宣泄厌恶文言文的心声⁷,但另方面更积极指引学习之道,如邀请王力、孙伏园、吕叔湘谈文言教学、文言教育,提供师生相关的知识及具体学习办法。

张中行同叶圣陶、吕叔湘、王力等语文专家一样,充分了解现代语体与古典文言的紧密关系,旁征朱光潜所言——善写白话文的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等辈,其实都得力于古文的滋润,因具文言根柢才写好白话文⁸,张中行也说过“‘五四’前后,

⁶ 张中行举例说:“问‘多少钱一斤’,答‘五块’,选好一条稍大的,问‘多重’,答‘二斤’,给一张票,成交,鱼是实,是物质,买了吃是家常事,都是由语言帮忙如此这般完成的。”见其《诗词读写丛话》,页3。

⁷ 如吴大琨呼吁:“在中学校中完全废除文言文”,见其〈谁使我们国文程度低落的〉,《中学生》第49号(1934年11月),页8(总页124)。

⁸ 朱光潜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的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见其《雨天的书》,《一般》第1卷第3期(1926年11月),页448。按:朱光潜发表该文时,署以笔名“明石”。

积极参加文学革命的那些人都会文言”（张中行，2007：页281），他这么评论：

“五四”以后，林琴南之流可以不提，就是大声疾呼提倡用白话写的人，因为会文言，有时还不免技痒，与老友往还，书札用文言，以至发表，有时还是来几首律绝。这方面的表现都可以证明，文言形成之后，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而且不很容易学会，可是有大量的人就是爱它，并用读和写的方式支持它。（张中行，2012：页44）

由于文言“不很容易学会”，所以在学文言这件事的基调上，他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鼓励有条件的学，容许没条件的不学”、“学，不轻易，学会了，有好处”（张中行，2012：页55）。扼言之，张中行主张学会文言并非如走蜀道之难，有些人反对学文言，其症结乃在方法不当，而不是文言本身太难对付。

三 文言教学的基本原则

对待文言，历来不只有认识的分歧，还有“学”和“用”的争议。旧时代因为文人要应付科考、处理社会生活，一定要学会文言，对古人，文言并无是否要学的困扰；但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白话定于一尊，许多人主张文言是死文字而必须束之高阁、扬弃，然历史的实际发展却非如此。五四以来的名家，笔下化入不少文言成分，即使是高举白话书写的胡适，倡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皆白话为之、也写了《白话文学史》，但晚年更勤于研究《水经注》，如张中行所言：

改用白话写已成定局之后，如何对待文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没解决的重要表现还有，五六十年来，教材里有文言，学生还在学。学，当然希望学会。学会，有目的。目的可以广，是接受文化遗产；可以狭，是欣赏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此外，有些人还认为，用现代语写可以从文言里吸收些营养。总的精神是文言还有用，应该学。可是也有不少人，从实际出发，认为学会很难，并且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帮助，浪费时间不合算，应该不学。学，有理由，不学，也有理由，相持不下，于是这文学革命时期留下的问题反而复杂起来。（张中行，2012：页211）

尽管文言、白话议题复杂，但张中行不纠缠于两极端，也不急着定论评判高下，而以较客观的立场持论，他认为双方所说都有理且多具事实根据，但也各有优、缺点。

张中行从国家、个人的角度提出可视不同要求而兼顾文言、白话两者，总的来说，即：“学，有机会；不学，有自由。”（张中行，2012：页213），此处须留意的是，张中行看似“模棱两可”的意见——可学、可不学，不也是另一种明确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尽力而为，不可则止”（张中行，2000：页86）。

要学文言，就须考虑怎样学的问题了。文言要不要学，众说纷纭，但张中行表示：

在还没有定论的时候，我们无妨认可两种情况或两种设想：一是如果有条件并且愿意学，学会了也不坏；二是既然还有相当多的人在学，如果想想办法有助于学会，那就把办法拿出来也不坏。（张中行，2014：页1）

又，为什么要学文言？张中行归结三大理由：

(一) 文言是很有用但不是非用不可的工具。(二) 就国家说, 应该使任何人都有学会文言的机会, 但同时容许任何人有不学的自由。(三) 就个人说, 学不学要看各种条件, 这是说可以不学; 但有学会的机会而不利用, 总是个不小的损失。(张中行, 1998: 页80)

基于这“学会了也不坏”、“拿出来也不坏”、“有学会的机会而不利用, 总是个不小的损失”的设想, 他主张在学、不学之间设计折衷的法子, 使愿意学、需要学的人, 有机会可以学会; 不愿意学、不需要学的人则无须耗时于此。

张中行提出的折衷办法, 乃“以熟为本, 以知为辅”(张中行, 2012: 页216)、“多读求熟, 以熟求通”(张中行, 1998: 页74)。为突显张中行的说法特色, 将其主张与一般常见的论点差异, 对照如下简表:

表2 张中行与一般常见学习文言的办法之对照表

一般常见的两种论点	张中行对两种论点的评价	张中行提出的折衷办法
传统：多读求熟，以熟求通。	赞同	多读求熟为本，理性知识为辅。
现代：多快好省，以纲统目。	存疑	
备注：整理自张中行〈关于学文言〉，《补学集》，页74。		

张中行倾向传统的学习路数为先, 不赞成只图规律的少读与只求速成的办法, 他列举五项理由:

(1) 规律是概括的, 远没有上面提到的由多读而来的种种模式那样细, 所以常常不能凭规律确定某一语句究竟是什么意义。(2) 到目前为止, 所谓语法规律, 我们的研究还粗糙得很, 有例外, 也难免错误, 现代汉语如此, 古汉语尤其如此, 这就难免诚心礼佛而佛不显灵。(3) 烦琐, 艰难, 最容易使学生甚至提到文言而生畏。(4) 把时间占去, 自然更难多读。(5) 以事实为证, 由多读而学会文言的人为数不少, 似乎还没有见过哪一个是少读只靠钻研规律而就学会的。(张中行, 1998: 页74)

尽管有如上的存疑, 但他并不反对要讲文言词句等相关知识, 只是在学习上的本末、轻重、先后, 应仔细辨明, 如此来学文言即非难事, 也不容易失败, 诚如他所言:

(1) 用适当的方法, 学会文言并不难, 时间拉长些, 负担也并不重。(2) 现在学文言大多失败, 是因为无兴趣, 无读书习惯, 不勤, 而想下小网得大鱼。(张中行, 1998: 页75)

他直指适当的方法, 就是以多读求通为本为先, 理性知识为辅为后。熟了, 就能学会、学好。学而能成为习惯, 就必须“熟”。他举看小说为例:

比如看《聊斋志异》, 文言, 典故多, 难懂, 但又喜欢鬼狐故事, 爱不忍释, 只好硬着头皮看, 这样看多了, 看惯了, 也就懂了。这是偏于感性的。还有偏于理性的, 比如读多了, 文白都熟悉, 看到“未之有也”与“未有之也”并存, 知道后一种说法是错的, 并能讲出一番大道理; 看见“把他请”、“把他请来”、“把他坐上车”并存, 知

道前后两种说法都不对，也能讲出一番大道理。不管是久而自通还是能够讲出一番大道理，基础都是熟，不是先记清知识和原则，然后用知识去分辨，用原则去衡量，判定是非。（张中行，2000：页239）⁹

张中行再三强调“多”与“熟”，并要引导学生使其有阅读及书写的学习兴趣，有兴趣之后，多与熟也不成问题了。

需特别指出，张中行对文言的认知观念，虽与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王力等辈相近，但操作手法上仍各有侧重。以下就方法、教材两端分说：

就方法，张中行与王力均重传统的熟读方式，认为规矩绳墨不宜凌驾其上，王力说：“即使是有心学习文言的人，也不应该仅仅以分析古文的词汇、语法、风格、声律为能事。必须多读古文；最好是能熟读几十篇佳作，涵咏其中。这样做，即使不会分析古文的词汇语法等等，下笔自然皆中绳墨。”（王力，1942：页10）王力这段话，其实呼应了张中行主张的两个原则：求多、勤熟。张中行多次呼吁“要大量地读”（张中行，2000：页190），他们都支持传统所谓的多读求熟，虽也不轻忽语法修辞等知识，但技法规矩宜于辅助而非主要。

就教材，叶、朱、吕于1940年代合编过三册《开明文言读本》，其卷头有逾五十多页的导言，讲述文言的性质、语言、词汇、文法、虚字，重视以科学的态度及方法研究文言，这篇导言还被孙伏园视为“一部文言的简明文法书”（孙伏园，1949：页8）；

《开明文言读本》出版三十年之后，1970年代末鉴于当时无相同属性课本可以取代，遂改编重印为一册《文言读本》，这册改编合并本的前言里，叶圣陶及吕叔湘对先前的编辑宗旨与方针，提出了补充说明，云：“一、文言作为通用的书面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要求学习文言时注意辨别它跟现代语的异同，是为了防止用现代的字义和句法去读古书，误解古书文义，也是为了纠正在语体文中滥用文言词语的不良风气。”

（叶圣陶、吕叔湘，2002：页4）此后，1980年代张中行则接续之，与吕叔湘合编《文言读本续编》。

吕叔湘与张中行合作的这本续编，在篇目选择及标注方式的见解上，出现了不同认知，张中行回忆这段前尘往事：

选篇目是大计，主要由吕先生决定。选编的目光与常见不同，比如选《大唐西域记》和《汉书·食货志》之类，以及有些篇不加标点，一般选本就决不会这样；连我更喜欢“攻乎异端”的也担心过于难，怕读者没兴趣。我向吕先生表示了担心，吕先生像是未思索，就说了一句使我深受教益、终身不忘的话：“学文言就不该怕难、只图兴趣。”所谓受教益，是这一句的“文言”可以换为“什么”，照做，就必不会一事无

⁹ 按：此段引文，耿志坚教授认为张中行并不绝对的理解文言文，谓：“因为语法学在他那个时候并不流行，也没有‘古汉语语法’这类的研究，所以他的话基本上是有问题的。且‘多’与‘熟’固然重要，但教学法太传统，以学生的反刍为基本概念，但是作者‘意内言外’的文句，是要靠经验的联想、创意思维的讨论、文句深究的发现，才可能有新的突破，这也就是现今以‘多元思维’进行阅读，以‘翻转课堂’进行讨论，为文言文学习走出一条新路的缘故。”耿师说法，系此备参。

成。但吕先生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原定不加标点的篇目减去一些。以后就动手起草。
(张中行，2006：页510)

张、吕的部分意见相左，其实正反映了吕叔湘因具深厚的古典底子，所以他一出手就是硬道理，就理想面，固然动机是好的、所选篇目确实也能开阔眼界，但就现实面，张中行站在一般学习者的立场发言也无可厚非，从实际的效益论，读者似乎真没多大兴趣——“印数，5000册，不再印。”（张中行，2006：页511），应验了张中行当初的内容太难之顾虑。虽然在续编本上，张中行无法完全落实对文言有效学习的“兴趣”、“熟读”之设想，但他独写（编）的课外读物，如《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及《文言常识》、《古代散文选》、《文言文选读》等，倒是提供不少关于学习文言的各方面知识，协助学习者加深认识文言、扫除学习上的路障。总的来说，教材及工具书的选择，他建议先后次序为：先一般后专门、先选本后全集、先今注后古注。

四 结论

台湾的中学国文课程目标，含摄了三大范畴：语文、文学、文化层次（刘怡伶，2014：页205-206）。国文课程除了语体文之外，依教育部所设定的课程目标，高中、高职生（五专学制前三年，亦属后期中等教育）亦需具备阅读浅近文言文的能力。为何要读文言文？五四运动打破了文言独尊的局面，确立了语体文在国语文教育中的核心位置，文言文在现代日常生活应用上的效用已大幅降低，又因古今词汇意义及语法有别，使学生不太愿意接近文言作品，虽然文言文时代已成过去，但文言文所蕴蓄的作者情感、思想以及历史文化，仍然具有价值。诚如张中行所言，往昔的文化遗产多保存在经史子集的文言书籍里，后人欲接受文化遗产，自然要去接触、研究甚至利用。文言、白话，历来是一大议题，张中行是当代对此用力多、耗时也多的重要学人，有多本关涉这方面的著作。尽管以今日的理解及经验去检验张中行的文言文观念及教学理论，不无局限，可是，以历史进程着眼，从张中行其实也可看出在当时的坐标下所作的新思考及突破。就时间轴的发展，必然会受时空的限制，以今回观，个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这是任何时代无可避免的时间差。因此，研究张中行的意义，本文是放在相对的位置去理解，如果可以用三个时间点去谈：

第一个时间点：张中之前的时代。

第二个时间点：张中行的时代。

第三个时间点：张中之后的时代。

第一时间点的人们，思考哪些方面、还有什么没做的？到了第二个时间点的张中行那个时代，他比以前进步的是什么？补强了哪些观点？有没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见解？到了第三个时间点的我们这个时代，以多元思维、翻转课堂的新视域去检视，张中行的所思所为迄今哪些仍值得参考？而他的不足之处是否正是日后吾辈接棒的重点所在？

扼言之，本文认为历史就是接力赛，一棒接一棒，不断精益求精。看待文言文教学问题，从相对的位置去了解应该还是比较周延的，较能窥知文言文的原貌及发展趋向，如果只截取一部分或某一个时间点，那就比较静态、意义较无法彰显。因此，本文着眼于时间轴的历史发展历程去研讨，希望相对周延审视张中行的观点，祈使不厚诬古人或唯古是瞻。

整体而言，张中行不是很守旧的人，在旧语体的学习取径上，基于实事求是的立场，兼顾新旧，不走极端。张中行屡屡强调多读、熟读及培养兴趣习惯，此牵涉了读什么与怎样读，这部分的指引非常具体，可征其诸作，此不复赘¹⁰。大体上，他力主学文言要“多读”、“勤”、“熟”、“知”，前三者偏于感性，后者则属理性的词汇语法知识。张中行的观念除受开明派文人的影响，也有自己侧重的论点，基本上他不唱高调，学与不学，也不预设立场，只是一旦要学，就得学通，学不通就无用——无法旧为新用。扼言之，现代人写文章可借镜文言的优点，如同蜜蜂杂采而后可酿成自己的蜜，张中行认同文言可以为今所用。但他的学用观念，又非学了再用的僵化思考，他主张：“学和用不是截然分为前后两段，而是在学的过程中，读懂了，就同时在吸收，也就是同时在致用，时时在学，时时在得。”（张中行，2012：页218）亦即学与用的关系，非有先后之别，而是边学边用。

总之，他指点学习文言门径之用心，此从吕叔湘为张中行所命书名《文言津逮》的“津逮”这一关键词可得到旁证，即彰显了其引领进入文言世界的桥梁角色，津原意“渡口”，逮是“到达”之意，从渡口搭船到达目的地，犹如学习过程，他以“过来人”身分为人指点迷津；吕叔湘更评其“以过来人的资格，把学习文言所可能遇到的困难，给读者一一指明，并且告诉他怎样克服，正如一个有经验的障碍赛跑运动员指点后来者怎样通过那花样繁多的重重障碍。”（吕叔湘，2016：页1）张中行对文言议题，往往出以总括与细说，无论是文白历史发展的梳理、各自功过的区别，抑或学习文言的方法步骤等具体操作，均有深入浅出的精辟阐发；又因其行文甚为平易随和，亲近普罗大众，颇利于阅读，相关书籍多次再版，于两岸流传广远。

参考文献

- 耿志坚（2016）《基础文言文活化阅读教与学》，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尽心（1999）张中行轶事，《北京纪事》，1，13-14。
 刘怡伶（2014）《现代国语文教育的探索与建构》，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吕叔湘（2016）序，张中行著《文言津逮》，页1，北京：中华书局。
 孙伏园（1949）中学的文言教育——兼评“开明文言读本”，《国文月刊》，75，8。

¹⁰ 其论述固可采者多，但说法亦有忽略或不足之处，例如他在《文言和白话》（页60）里推测《水浒传》、《金瓶梅》作者不敢露脸是因为俗（白话）。究竟这些小说是因内容（淫秽淫盗、囿于封建礼教）还是载体（俚俗的白话）使然？其仅以俗字带过，说法即有不完整之虞。

- 王力（王了一）（1942）文言的学习，《国文月刊》，13，10。
- 吴大琨（1934）谁使得我们国文程度低落的，《中学生》，49，8。
- 叶圣陶、吕叔湘（2002）前言，吕叔湘著《吕叔湘全集》，页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张中行（1998）《补学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张中行（2000）《作文杂谈》，香港：三联书店。
- 张中行（2006）《流年碎影》，北京：作家出版社。
- 张中行（2012）《文言和白话》，北京：中华书局。
- 张中行（2013）《负暄续话》，北京：中华书局。
- 张中行（2013）《诗词读写丛话》，北京：中华书局。
- 张中行（2014）《文言常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张中行（2016）《文言津逮》，北京：中华书局。
- 张中行（2016）《张中行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朱光潜（1926）雨天的书，《一般》，1（3），448。